

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个人是受害者，但是，康德则认为是个人的疏忽懈怠才导致人们犯下了过错，因为虽然整个社会并不开明，但个人仍然应该敢于认知。

《启蒙辩证法》产生的影响是弱化了人民能动性的作用，把失败归咎于文明。即使这种将问题社会化的做法是正确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并未告知我们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人类对大众文化的消费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更复杂。耗费数小时观看没有价值的电视节目，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审美价值观，而是他们赞同批评家的观点：夜晚坐在电视机前休息这个行为与审美价值观没有关系。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主张有了一个更现代化和更积极的版本，这个版本由丹·欣德（Dan Hind）提出。他认为在这过程中有两种分歧，分别是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与反启蒙运动提倡的非理性二者之间的分歧，以及启蒙运动内部的两类人，即奔着善意的目的运用理性思维的人和偷偷摸摸利用理性思维和方法扩张政府和团体权力的人之间的分歧。这两种分歧相比，后者要比前者更重要。用尼采的话说就是，理性思维非但没有为道德价值起到支撑作用，反而时常被用作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他结合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来支撑自己主张：我们必须确保运用理性思维去践行启蒙运动的理想，使真理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展真挚的公众辩论和公开的信息交流。⁷

启蒙方案：涵盖启蒙运动宝贵遗产的愿望清单

意识形态的时代已接近尾声。提倡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的处境

紧张，原因是它未能给社会每个方面都带来福利，甚至在某些背景下还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比如，新自由主义提倡解除管制和金融产品创新的哲学思想，间接导致了2007年由次级房贷有关的金融工具失败而引起的经济危机。而如今，启蒙运动又是如何与政治话语牵扯到一起的呢？

所谓的“启蒙方案”一般被视作一个提议，即在遇到伦理和道德两难的问题时运用理性思维。这个提议不像主要的意识形态那么野心勃勃。虽然二者的界定方法不同，但是基本想法相同，也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思考普通的原则和权利，通过淡化地域条件和偏见的影响，来解决伦理问题。

若把这个想法当作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那就是在误述事实。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数名思想家都对人类理性的能力持正当的怀疑态度，包括洛克、贝尔、孟德斯鸠、休谟和斯密，尽管他们的怀疑方法不尽相同。当然，还有一些启蒙哲学家对理性报以坚定的信念，启蒙方案是从康德和他的绝对命令说中获得的启发。但是，该方案赖以依存的理性主义在非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中也存在，柏拉图就是其中一位。

乔纳森·伊斯雷尔称启蒙方案是启蒙思想“激进的核心”，镶嵌在由斯宾诺莎、贝尔和狄德罗连成的弧线上，为后来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宝贵财富。相反，他称“许多传统上被视作启蒙运动主要英雄人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包括洛克、牛顿、休谟、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康德，他们的思想并未被发展和阐释为一个具备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启蒙道德哲学体系”。对伊斯雷尔而言，启蒙方案可以总结为8个基本点。

1. 在判断什么是真理时，把哲学，包括数学和历史原因作为唯一专有的衡量标准。
2. 不予考虑任何超自然的意志、魔法、脱离肉体的精神和神的旨意。
3. 所有人，无论种族或性别，一律平等。
4. 伦理学中的世俗“普遍主义”扎根于平等，以及对公平、正义和仁爱的强调中。
5. 全面宽容和思想自由基于独立的批判性思考。
6. 到达法定性成熟年龄的成年人在生活方式和性行为方面拥有人身自由，保护未婚和同性恋人士的尊严和自由。
7. 公共领域里，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政治批评自由、出版自由。
8. 民主共和制是最合理的政治体制。⁸

虽然很明显启蒙人士并非接受这份清单里的所有内容，但它很好地总结了启蒙运动的宝贵遗产。更加温和的思想家曾经警告过，要小心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秩序强加给未做好准备的社会，而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负面结果可以成为这些思想家观点的佐证。激进的启蒙运动必须等待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可以迎来经济、社会和教育变革，来实现这个道德愿望清单上的内容。即使是现在，这份清单仍能引发很多争议和分歧。

启蒙方案在现代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他在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中纳入了一种解决伦理矛盾的方法。他的思想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支持立法机构, 这个机构允许每个人去追寻自己关于道德上美好生活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这种宽容中获益。但我们仍然需要解决争端的方法, 罗尔斯的建议是, 先思考一下满足我们基本要求的最小制度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 就会产生最公平的结果, 因为我们不会受到鼓动, 将体制设置成对某一方有利, 比如有利于男人、白人、同性恋、基督徒、穆斯林、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等。所以我们应该想象一下, 如果罗尔斯称之为“无知之幕”的东西以某种方式阻碍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和特性, 甚至是性别, 理性的人们会做何感想。尝试这种想法可以让我们理性地追求一个正义的体制。

这些思想意义非凡, 而且受到了康德思想的极大影响, 但是它们同样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攻击它们的人认为这层“无知之幕”是一个不合情理也不得人心的虚构事物, 而且关于我们的各种事实, 包括性别、为人父母的身份、文化身份等是构成我们个人身份的必要元素。这样罗尔斯的思想就会引出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把这些全部隐藏在这层幕后面, 还可能当一个理性的人吗? 道德并不仅仅是一套我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遵守的规则, 它深植于文化之中, 而且不可能轻易在极端时刻分离或妥协。

这些批评家包括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Alisdair Macintyre)、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 和安妮特·贝尔 (Annette Baier), 但是这个立场最初且最基本的陈述出自一位真正属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

物——大卫·休谟。安妮特·贝尔在作品中曾表达过对休谟的支持，这并不是巧合。⁹

罗尔斯派人士则回应说，别这么严肃地看待“无知之幕”，它仅仅是为了说明更广泛的观点而采用的一种表达策略。要求人们去想象一个他们好似被剥夺了一些特征后的处境，这种做法并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而且也并非毫无意义。他们不需要真的卸下那些特征，只需在短时间内处于那个状态下，去思考关于正义的政治体制的问题。

还有一个批评罗尔斯思想的观点来自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关于历史或社会概莫能外的“叙述”，所以，他们也绝不会让理性、科学和世俗宽容拥有比其他思考方式更优越的地位。¹⁰ 关于什么构成了一个人，后现代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都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考虑得不够完善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的自我是独立自主的，可以独自行动，即使在社会中是被孤立的，只能通过不完美的感知去了解这个世界和其他人。所以，《鲁滨孙漂流记》在那时的出现并非凑巧。一个相反的观点则是，男人和女人都是群居动物，集体身份比启蒙理论家所想的要更加重要，而且意义是由集体创造出来的，所以自我也是依靠社会构造的。鲁滨孙在岛上很可能确实是一个人，但如果他没有适应社会，就不可能完成他所完成的任何一件事。

约翰·格雷也许是启蒙方案的最大死敌，他认为该方案中自我否定的特征粉碎了所有幻想。“有些愿望使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在整个近代时期重新活跃起来，而事与愿违的是，我们发现在近代结束时，关于种族和宗教的特殊主义重生了。”罗尔斯犯下的错误是启蒙传统的必然结

果，那就是“将道德观等同于公正……所以拒绝给予个人事务和感情道德地位，除非它们符合客观的正义标准”。¹¹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许多启蒙人士认为宽容必然会带来多样化，在未受到启蒙的地方，人们才会被迫受到文化的束缚，反之则是错误的。

许多评论家强调启蒙运动带来的积极结果，最突出的就是宽容和个人自由的传播。比如，A. C. 葛瑞林（A. C. Grayling）认为西方社会能享有自由和良知的权利是值得庆贺的胜利。他还把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狄德罗和伏尔泰等人，放在一个时间跨度更长的背景中，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美国民权运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一起讨论。伊斯雷尔认为启蒙方案的批评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温和的启蒙运动和激进的启蒙运动混为一谈，还攻击启蒙运动的巨擘，比如康德，但激进的启蒙方案很多内容其实与他们无关。

最后这个问题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在这个初级读本中拆开论述。但是，启蒙方案的拥护者会同意伊斯雷尔得出的结论：安妮特·贝尔或伯纳德·威廉姆斯这种出于为自由着想的善意才贬损启蒙运动的人，“为广大的社会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宗教激进主义者、反民主者以及反启蒙运动的追随者提供了巨大但却谬误的影响力……后现代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声称‘所有的价值观都同等有效’，这对民主价值观、平等主义价值观和个人自由构成了主要的威胁……为那些蓄意侵犯个人自由、民主的完整性以及所有人基本平等的做法提供了一块庞大的、由不正当的借口形成的遮羞布，相当于默许了将长期受到鄙夷的少数群体、妇女和同性恋者继续置于从属和不利地位”。¹²